

Book

多长一个心眼 多留一份怀疑

——评《货币战争》



◎唐岳华

这本在网上早已炒得非常之火热的《货币战争》,给了国内读者全新的体验,内容足以令每位拿起此书的读者震惊。作者以激烈的言辞气势磅礴地讲述了英格兰银行成立300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乃至世界经济惊心动魄的历史沿革。出版社把它列为“商业史”,我倒更倾向于把它视为“另类经济史”。国外近年也多有类似给人极大震撼的著作,比如去年12月出版的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上世纪90年代留学美国,获美利坚大学硕士学位,曾担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高级咨询顾问。这一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本书的警世意义,首先要承认,在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对本书提出的尖锐问题保持高度警惕时很有必要。不过,对书中具体的观点,则要细加分析。

说的雅一些,本书让中国读者看到了对当今国际金融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见解,说的更直一些,本书的判定有一种被“洗脑式”的感觉。最典型的“洗脑式”观点就是在“美联储:私有的中央银行”一章中所点明的:“直到今天中国也没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

《货币战争》
宋鸿兵 编著
中信出版社 2007年6月出版

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美国政府根本就没有货币发行权”。

按照笔者的理解,对于美联储的性质,其本身就是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没有定论。有人甚至说过,就连法院也无法对其性质轻易做出明确的判断。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美联储是一个“半政府”性质的组织,其拥有“企业式”的股权结构,同时也直接受总统和国会的监督,执行美国中央银行的职能。简单来说,美联储就是美国政府与社会各主要银行代表为了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成立的公司,该组织机制的确有某种企业性质的成分,自然是由不同的私有银行所控股。美联储这种分散化的私有中央银行体制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若说完全由几个国际银行家所控制并为其服务,值得商榷。

其实,本书的立论,反映了当今相当有影响的“国际银行家阴谋论”。阴谋论(the Conspiracy Theory)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在国外盛行,它把一些公众难以解释的事件归咎于某些神秘的人物或社团,典型的如共济会、精英社团等。本书以较大篇幅提到了神秘而深不可测的剑桥“使徒会”、美国外交协会、三边委员会等精英集团,部分内容明显是由作者依据外文资料编译而成,部分内容后标注了出处,笔者按照出处查找所引用的资料,其论调与阴谋论相似,原本由其来也。

耐人寻味的是,书中的大段场景和心理细节描写、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注明出处。

书中推断,称雄欧美历史的银行业“天王级”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目前与美国银行业巨头都有密切联系。然而据接触过罗斯柴尔德银行

集团的银行业内人士称,早在186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退出了美国市场,之后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目前主要在欧洲做并购重组业务,2006年位列世界并购排行榜第13位,一年营业额不到100亿美元。

书中最有争议的当数对国际银行家的描述。作为“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国际银行家们不仅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反而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获取暴利的惯用手法有两种,第一种手段是制造经济衰退,他们利用超级通货膨胀之后资产泡沫破灭的方式,在货币的狂跌和暴涨过程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这一过程被称为“剪羊毛”。他们策划并制造了300年来几乎所有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从1837年大恐慌到1929年大萧条,从上世纪80年代金融核弹袭击日本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第二种手段是策划战争,战争使各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向银行家融资,让他们大发战争财。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都可归结于国际银行家,林肯、肯尼迪和里根等多位美国总统遇刺,最后全都归结于“国际银行家”。描述、推理十分精彩,悬念叠出。

无庸置疑国际银行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标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离开了货币都无法运行。但是国际银行家对世界经济的掌控力是否到了书中所描述的那种程度,笔者认为,结论需要慎重之又慎重。

另外,该书作者把货币分为债务货币和非债务货币两大类,即当今主要发达国家所发行的法币和以金银货币为代表的非债务货币。作者直言,在纯粹法币制度下,最终将无可避免地产生恶性通胀,最终世界范围内的严重衰退,这也是绝对的逻辑。作者最后建议中国政府花重金购买黄金,然后分阶段逐步建立一套黄



金、白银支撑下的“双规制货币体系”,也就是返回到金本位制。这样的建议到底切合不切合中国当前的现实呢,购买黄金就真的能使中国经济一劳永逸吗?本书对此似乎缺少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论证。

当然,书中那些警世观点确实值得人们深思。书中提到世界银行和IMF等布雷顿森林机构对其资助的所有国家都准备了四服药: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和自由贸易,即出让国有资产、资本自由流出与流入、完全市场化和降低贸易壁垒,这样的事实的确是存在的,也是受援国接受捐助时所必需倍加小心的。作者对国际金融势力可能采取与日本相同的战略来对中国实施金融打击的估计也是有远见的:首先是制造中国的超级资产泡沫;然后实施

“远程非接触式”的金融核打击,打垮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最后再以跳楼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无论如何,对于正在开放金融业的中国来说,尽早了解可能存在的金融危机并提早采取防范措施对中国经济未来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

另外,本书对于中国金融开放面临风险的战略危机意识非常值得提倡。中国正处在这一特殊的“战略拐点”上,需要实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突破。对于金融领域的开放,国内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是“战术”层面的风险,但实际上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中国金融业要顺利走向开放绝对不能少了这样的战略危机意识。

■新书过眼

《公司进化论》 伟大的企业如何持续创新



机械工业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五月出版
陈劲译
杰弗里·摩尔(Jeffrey A. Moore)著

硅谷策略大师摩尔在思科历经5年的研究和思考后,详细总结了14种创新类型,试图以此解决21世纪商业中最根本的挑战——在剧增的全球竞争中获得盈利性增长。摩尔将优秀的核心理念和优秀的管理实践清晰地结合在一起,解说如何指导管理团队,如何选择适合的创新类型,巧妙地加以利用,以创造与其直接竞争对手之间的绝对差距,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商业世界里创造竞争优势。为了创造这样的成就,无论是快速增长的高科技企业,还是增长缓慢的商品化成熟公司,都必须持续不断地重新评价自己的外部和内部,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配以适合的创新战略,重新识别自己的核心,令资源重新流向核心活动。无怪乎BEA系统有限公司创始人、Cassatt公司CEO威廉·科尔曼要说,杰弗里·摩尔提供了成功引领商业周期各阶段的产品动态和市场创新的实践指南。

《铁三角:透视 凯雷集团的秘密世界》



上海远东出版社二零零七年四月出版
石志宏译
(美)丹·布赖奥迪著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Carlyle Group
(The Iron Triangle)

就如许多学者们所做的那样,像剥洋葱那样一层层解剖“美国经验”,可能需要花费毕生的时间。无论在哪里停下脚步,都会面对构筑历史的同一个问题:国家合法权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而从本质上来说,这正是促成本书的同一问题。掌管着140亿美元的世界最大私募基金投资公司之一的凯雷集团,其秘密远比人们知道的要多。员工花名册看上去就像是一部商界与政界的名人录,有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或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更有前国脚。因此它在人称“铁三角”的商界、政界与军界运行得水乳交融。经济新闻记者丹·布赖奥迪近距离审视了凯雷集团的多宗交易,让读者得以进入这个“紧密连结全球的巨大网络”内部,观察这些交易是如何缔结的,各国政府又是如何被施加影响从而接受凯雷集团的。明白了集团所敲定的一桩桩生意,让哪些人改变了主意,以及是如何让他们改变的,也就明白了当今国际经济政治诸多大事件的内幕。

《香港史》



中央编译出版社二零零七年五月出版
王皖强、黄亚红译
(英)韦利什著

在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之际推出的本书,写作却是在1993年。作者是研究英国史的专家,出版过深受好评的《英国史》、《南非史》等著作。本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西方出版的最权威的香港通史,作者深入分析了英国国内政治对英国对华政策以及香港前途的影响,系统、全面地叙述了1838到1990年间香港的发展历史。为撰写此书,作者除参考数百种相关著述外,还遍访英、法、美的档案馆,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如律劳卑使团、港脚贸易、两次鸦片战争、英国强占九龙、新界、“香港海关封锁”、香港与1911年的中国革命、香港与抗日战争、战后香港的发展等,引证了大量原始史料,表现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熟悉和认知。用“不情愿的双亲”作前言来说明150年前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应是很恰当的比喻。只是许多有关香港回归重大的事件来不及论述,尚需待日后修订补充来使之完备。

大浪淘沙:淘去了什么,又留下什么

——评《张国焘传》



◎薄闻

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从来都是有难度的,而一个有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人物的传记则更是难上加难。比如为张国焘作传,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应多写,哪些应少写,不能不煞费思量。

张国焘一生百味杂陈,成年后的前20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出过很大贡献,后40年投奔了国民党,最终又遭国民党遗弃。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书籍和研究文章中,他都是反面人物。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张国焘传》,是姚金果、苏杭两位博士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依据大量的第一手历史文献,尤其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绝密档案,揭开了笼罩在张国焘身上的层层迷雾,回答了长期以来人们所不解的问题,从而使读者有了接近和了解张国焘的一个平台。

五四运动时期,张国焘是学生领袖之一。他追随李大钊和陈独秀,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并且在中共创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一大,他是会议主持人。在中国共产党公开指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他是第一任领导人。在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大会上,他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也是中共领导人中惟一获得列宁接见的人。土地革命时期,作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他为扩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发展壮大工农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带领红四方面军开创了川陕根据地。然而,张国焘又是一个有着重大错误和耻辱的人。他曾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在严刑逼供下出卖了李大钊等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他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制造了

《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杭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3月出版

许多冤假错案。长征时期,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与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分歧,最终“另立中央”。

本书最难得之处还在于以翔实的史料,叙述了张国焘投奔国民党之后的经历,虽然篇幅不多。1938年4月张国焘投奔国民党之后,蒋介石曾寄予厚望,将他派到军统局去发挥“特长”。然而张国焘在戴笠手下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不久便受到戴笠的歧视和沈醉等人的排挤。1940年至1945年,张国焘连任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5月,张国焘在国民党六中被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又兼任了“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委员。但因没有什么建树,仍得不到重视。1948年11月,张国焘一家随着国民党高级官员一起逃到台湾。受到冷遇后于1949年冬携妻带子离开台北赴香港。在香港,张国焘办过杂志,做过买卖黄金的生意,但都不遂心。1953年和1958年,张国焘曾两次有过重回大陆的要求,但最终都未成行。他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提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有关情况。从1961年开始,受美国堪萨斯大学委托,他开始撰写《我的回忆》。1968年,红卫兵运动一度波及到香港,张国焘甚为惊恐,便与妻子投奔在加拿大多伦多多研究数学的大儿子张海威。1979年12月,82岁的张国焘冷死在多伦多多的老人病院。

每个人都在历史中扮演着他的角色,无论放大还是缩小,既无法磨灭,也无法掩盖。而人物的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本书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了张国焘与李达、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毛泽东、朱德、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许继慎等共产党人之间的恩怨,描述了张国焘与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戴笠、毛人凤、沈醉、蔡廷锴等国民党人的合作与冲突。这对于读者更深刻了解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无疑大有裨益。

在张国焘这样一个结合着正义与邪恶的矛盾,成就与错误并存,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人身上,后人可以琢磨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时代局限下 民企生存状态依然扭曲



◎徐瑾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每段历史的不可逆性以及不甘于平庸的自我期许都促使每个时代的人深信站在独一无二的风口浪尖,身处不好不坏的年代好像平淡得可耻。或许,这只是个试验的年代?至少,苏小和这样认为。

恍然,已是检点30年改革的时候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民营企业对于制度变革的推动力量无可否认,一群原本微不足道的人物改写了历史;时过境迁,今儿个资本已成最大的母体,为企业家立传为公司立史在当下似乎为了为民生代言立命的紧迫感,因为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相对自如地完成对历史的诠释。

于是乎,在丰富的管理案例中,在繁多的财经特稿中,在嘈杂的商业评论里,人们读到了一个又一个以雷同的话语系统完成的企业宏大叙事:一个小人物,心比天高,顺天时争地利,搭改革之春风,乘经济之快车,万千惊心动魄之后一个华丽转身,修得正果,或许在此之后,还应该加上国际战略,资本市场,企业慈善,公司责任等等时髦词汇。幸运的是,毕竟还有人能坚持洞察“光荣与梦想”背后的局限与乏力。

苏小和关于民营企业的话题

《局限》
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的命运
苏小和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年6月出版

触角,最早由对多元化神话的解构开始。从2000年以后,迈克尔·波特代替德鲁克成为企业偶像,不少管理论坛频频向波特致敬,这位全球竞争力之父的教义其实也相当简明:在美国,非相关行业并购的转卖率高于70%,这说明大部分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失败的,企业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差异化与专业化。只是无论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波特的讲座上表现得多么热情虔诚,在现实中仍在尽可能地扩张,要将多元化进行到底。

为何波特的理论在中国变味、失效?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国内不少学者以及企业家找到了多元化的典范——GE的杰克·韦尔奇。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战略之争,但在中国语境下,远非那么简单。复制过来的战略术语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匹配,只能是奢侈的空中楼阁,或者,我们根本就缺乏谈论现代企业的元制度环境。在公权利难以制约的环境下,私有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民营企业的处境首先是谋求生存空间,短期投机行为因此更有激励,而所谓的多元化游戏只是简单的堆积,路径总是尽可能地多进入厚利产业,谋求快钱。而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所谓的企业战略,只能是异邦的想像。如果能够明白这点,也就明白苏小和逻辑的起点:一个大政府背景下的民企生存状态只能是妥协而扭曲的。

《局限》立意在于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的命运,或者本土文化的商业模式研究,但是视角却游离于主流话语内外。书中,国际管理理论失效,企业宏大叙事终结,甚至出现的企业家,也大多很虚弱;穆军因对潜规则的默许付出十年维价代价;唐万新的梦想永远无法照进不宽容的现实;魏文彬无法推行一个简单明了的动议;孙成钢陷入了

自身的悲剧中无可奈何……作者调查了相当多的中国本土企业,它们的商业模式惊人雷同。中国人复制的能力真是太强了,这注定了中国企业的普遍短命,同时也使得本书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保持相当的冷峻。

眼下,乐观的理由比比皆是,而悲观则更需要立场,苏小和引了另一别人的话“中国企业的管理相当于30年前的日本,100年前的英国”来表明他的立场。对于东方企业文化生态的弊端,他有显然着更为具体的理解,那种所谓的感情式管理后果难测,中国式的聪明往往导致管理缺陷,企业领导决策随意性带来决策的低效率,企业家缺乏管理素质,国企民主过度,而民企独裁成性。语虽偏激,却亦占其理,几千年的入治积淀让国人几乎本能地以道德代替规则,现代性的阳光普照毕竟来得太晚,商业文明也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

“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先有政治,后有经济。”、“必须要像搞政治一样搞企业”,“在中国,不懂政治是搞不好企业的。”……中国企业文化泛政治化的倾向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狂热,大多数企业家的说教常常是以这样开始,苏小和甚至以为《水煮三国》的流行揭示了国人常识的错误,以规模来谈论划分企业,而不是产权。阿玛蒂亚·森一再强调应该把自由作为发展最重要的标准,可是在私人产权没有明晰划定的情况下,一切规则难免暧昧,即使短期内可以超常发展,但是制度缺失的阴霾却使未来难以预测。

苏小和的工作本身亦带有试验性质,他或许道出了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困境,但要论解决思路,却已经超越这一代人的能力,也许,这就是试验的局限,时代的局限。